



## 赵旭先生序

### 让历史记下这沉重的一页

我与武宜三先生是 2007 年在香港参加国际笔会上认识的。在那次笔会上，世界各国作家汇聚一堂，谈文学、论创作，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礼堂读诗歌、论世事，让我在短短的时间里近距离接触了世界各国一些优秀作家。就在这个会议期间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花白头发，身体微胖，语言不多，一天到晚忙于会议接待，总没个休息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武宜三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这两次会后倏忽之间十多年就过去了，有一天武宜三先生给我发来电邮说他在统计 1957 年的受难者，能不能将我知道的受难者整理出来发给他。于是，我就将家里的几位右派长者详细写出后告诉了他。大约过了两年时间，有一天我打开电脑看见他给我发来了他统计整理出来的《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这个大辞典分门别类，将中国大陆每一个省里各下属县的右派分子罗列了出来，而且人名、时间、地点、经历是那么的详实，看后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正如大辞典序言中说的，“十多年辛苦不寻常，在没有任何资源、档案被封锁的情况下，‘大辞典’的条目（即右派分子个案）已经有 3 万多个，图文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了。”

这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这是多么艰巨的一项工作，我当时看到原稿确实有些吃惊，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是怎么完成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做幸存右派的采访，我知道每采访一个人是多么的艰难，除了顶住社会的阻挠和压力之外，采访对象和其亲属都怕影响自己和家庭而拒绝与我见面。我曾经有一次为了采访一个人，通过层层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地址，

与本人联系好坐上飞机按时去后，却被其家人拒之门外，因为这些人家在 1957 年和其后文化大革命刀光剑影的岁月里，已经被整怕了。他们害怕言者有罪，他们担心一句话不慎将再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在采访的过程中，经常要查阅一些档案，可就是查阅一个简单的档案，托关系找熟人，还必须有两个以上党员在场才能做的。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做这件工作不要说找寻资料，进行采访，就是将这么多的文字看阅一遍，也必须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由此我知道，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必须有还原本真历史的一种崇高责任，而且须有一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没有这种信念的支撑这件事情是做不好的。因为 1957 年的反右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沉重如山，将这些宝贵历史资料整理出版的浩大工程没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是完不成的。

今天我们回顾毛泽东在 1957 年发动反击右派的这次运动，它是当代一场非常卑鄙恶劣的禁言运动，是违反宪法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张彻底转变为封建独裁专制的倒行逆施，是几千年来文字狱变为文字和言论狱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反右运动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长久的，反右运动仍然让当今的人们心有余悸，不敢说实话，谈右变色。

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今天都应该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今日里成了一个不会说真话的民族？尤其一些道貌岸然的专家学者和号称一时的文学巨匠都成了说假话的附庸。为什么专制集权给中国造成反右运动、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贪腐泛滥、一桩桩惨案和灾难，人们都视而不见，大多数人们还沉浸在歌舞升平的虚幻之中，而对于社会脊梁知识分子也同样装聋作哑没有了为民族和社会的担当。

有人说，反右运动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给打断了，毁掉了自中国近代以来培养出来的所有精英，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道德文化，使得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在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之时就过早夭折了。但实际情况是，在文革结束以前，知识分子作为被全面专政的对象，而受到残酷打击，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怎么进行社会的担当。而如今，年轻知识分子被洗脑、或以利益相威胁受到打压利诱，大多数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他们无法进行社会的担当。

1957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那场惊心动魄、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现在梳理那场政治运动，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反右运动就不会有其后吹牛冒进的大跃进；没有疯狂的大跃进就不会有 1959 年的反右倾，也就不会有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没有三年大饥荒就不会有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没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就不会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这只是个假说，而历史却是在一条一错再错的轨道上运行了整整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对于无数家庭和个人来说，这惊心动魄的二十多年使多少家庭和

个人陷入绝境，使其精神和肉体遭受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们今天研究反右运动，不仅仅是看它怎么将现当代以至近代培养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使得无数家庭和个人遭受奴隶般的苦难，而主要须看它怎么去颠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怎么将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完全翻了出来，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制度和法律在社会中规范人们行为是多么的重要。我在多年的采访研究中看到，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不仅仅左派们疯狂地打骂迫害知识分子和受害者，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性中最肮脏的东西都被翻了出来，受害者本身和家人也在做着一些龌龊的事情。

运动中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告密丈夫，丈夫给妻子贴大字报，朋友之间互相揭发，这一切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比比皆是，表现的是那么丑陋。在反右运动中，有些担任领导干部的右派在反右运动开始时，昧着良心在单位划了大批的右派分子，他本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派分子，可是后来由于被更狠毒更阴险的政敌倒打一耙而划为右派分子落难到了夹边沟。有一个单位领导看上了单位职工的女人，将这个职工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从而霸占了这个女人。

有一个叫“维民”的作者，他在1957年9月6日《甘肃日报》上发表了《王京的“略论行政手段”在说什么！》落井下石来揭发批判《甘肃日报》社含冤死在夹边沟的优秀编辑王景超，而这个“维民”自己后来也被另外的一些人揭发批判而沦为右派分子。所以说，人性的深处始终隐藏着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就会野蛮生长。如果没有信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人在一定气候和环境下就会变成嗜血的魔鬼。我在采访夹边沟的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受害者本身也是施害者。

在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十多个管教干部，他们要管理三千多名劳教人员，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以右治右，用一点蝇头小利引诱劳教人员之间互相告密揭发，挑拨劳教人员之间互相残酷打骂。夹边沟农场之所以死了那么多人，除了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整个大环境将右派当成反动派之外，劳教人员之间互相施暴，互相残害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通过多年对反右运动的研究，我发现反右运动受害者中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血泪的故事，但他们又都是在反右运动的大背景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反右运动不仅仅划了55万（官方数字）右派分子，反右运动还将肃反运动中很多一般历史问题没有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又给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且将解放军里和工厂里所谓有右派言论的战士和工人给戴上了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帽子。另外，反右运动还波及了大批实事求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地方主义反党分子。所以说，反右运动被伤害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国家公布的数字（一说55万，另一说是317万）。至于反右运动牵扯进来而被影响的家庭成员和亲属粗略估计不下上千万人。

当然，对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阴谋”运动，它必然会受到历史无情的、公正的裁判。历史只会宣判这次运动的发动者所犯下的反人类文化文明、反人权

人道和反民主、自由的滔天罪行。历史也将会证明，反右运动的发动者以及执行者虽然他们猖狂于一时，他们来势凶猛、气势汹汹，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势和暴力在人间造成极大的悲剧，使得千千万万无辜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亲情反目，暴尸荒野，给无辜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大多数当事者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得到了改正，可是他们并没有瞑目，他们没有听到整人者的忏悔，没有看到中国人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却没有汲取教训，而且还有罪恶历史以新的方式重新再现的可能。

我们今天研究反右运动时要看到，为什么专制者这么害怕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要蒙住中国人民的眼睛不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他们窃取的政权是不合法的。他们为了维护他们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这些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知识分子会唤醒广大人民的觉醒，会使他们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他们必须豢养一批被他们控制思想的御用左派，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大革文化命，让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丧失殆尽，今日的五毛愤青把人类最美好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统统归为西方思潮，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最大障碍。但我们知道造成冤假错案成山，贪污腐败泛滥，其根源就是没有监督制约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

这就让我们想到，健全的制度才是防止灾难再次发生的保障。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同样，权利产生专制悲剧和贪污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历史惨剧和腐败泛滥成灾。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当政者不让人们知道历史真相？为什么在中国将官员的财产公布都这么困难？因为权势者及其子女家属的贪腐触目惊心，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有了民主自由和司法独立他们会失去一切。我们今天研究反右运动，主要因从体制和法律入手进行探讨。好的体制犹如好的道路，它可以让人们来去自由，行走便捷，并很容易抵达人生理想的彼岸。因为在好的体制下那些越优秀的人越是可以充分表现他们卓越才能的。而在坏的体制下，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制衡，一个人越是有才能，可能他在私欲膨胀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会更大。

现在一些既得利益者说什么三权分立、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多党权力制衡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由此荒谬的说法那么集权统治、控制舆论、司法被行政权利绑架，军队私有化、一党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东西了。在当今社会人类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璀璨夺目的精神文明，这其中就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制衡权利的累累硕果，这些硕果是人类共同的宝藏，是包括我们中华民族在内世界各族人民都应该分享的财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从短期来看集权统治确实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但正是因为这样一旦遇到一个品行恶劣之人，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抢救历史还原真相，给人民一个真实的历

史多么的重要。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采取的欺瞒哄骗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历史不但被他们美化，而且事实已经完全颠倒。

所以说整理反右运动的资料，已经不是武宜三先生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重建自由精神，再铸民族脊梁，走向民主自由国家的希望。

2019年3月9日

〔作者赵旭，生于1954年12月10日，甘肃省积石山县人，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是长期从事反右、文革史研究的学者，有多部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和历史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出版。〕